

# 博尔赫斯与终结论

陈 博

---

**内容摘要：**在终结论肇画的版图中，博尔赫斯间接或直接地参与了某些论题的讨论。在《〈吉诃德〉的作者皮埃尔·梅纳尔》中，博尔赫斯的“想象文本”模糊了现实与艺术的界限，同马塞尔·杜尚、安迪·沃霍尔等前卫艺术家的作品一道启发了美国著名哲学家、艺术批评家阿瑟·丹托，使他提出了“艺术终结论”。博尔赫斯致力于小说技巧（如元小说、互文性、讽拟等）的创新，却公开宣布了“小说的死亡”，以企盼史诗的复兴以及诗人创造者身份的合一。面对新媒介、新技术和信息内爆带给书籍的冲击，他坚决捍卫书籍的地位，反对书籍消亡论。博尔赫斯以一位作家的知性思索影响了艺术和文学创作的发展。

**关键词：**博尔赫斯；阿瑟·丹托；艺术的终结；小说的死亡；书籍的消亡

**作者简介：**陈博，文学博士，中国矿业大学文学与法政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访问学者，主要从事西方文论研究。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文学巨擘博尔赫斯诗学研究”【项目批号：12CWW033】、江苏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博尔赫斯文学思想研究”【项目批号：10WWC006】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项目批号：2013W25】的阶段性成果。

---

**Title:** Jorge Luis Borges and the End Theories

**Abstract:** In the map of the End Theories, Jorge Luis Borge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participated in some topics. In *Pierre Menard, Author of the Quixote*, his imaginative texts confused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reality and the art, which inspired Arthur Danto, a famous philosopher and art critic of America, to put forward “the end of art”. In addition, there were some other works of avant-garde artists, such as Marcel Duchamp, Andy Warhol, and so on. Although Borge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innovation of novel skills, such as the meta-fiction, intertextuality and parody, he publicly announced “the death of novel”. Through this, he hoped for the revival of the epic and the integration of poet and creator. Nowadays, facing the impact that new media, new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implosion had on books, Borges resolutely defended the position of the book and opposed “the demise of book”. Borges has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art and literary creation with his intellectual thinking.

**Key words:** Jorge Luis Borges; Arthur Danto; the end of art; the death of novel; the demise of book

**Author:** Chen Bo, Ph.D. in Literature,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Literature, Law and Politics,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221116, China), and a visiting scholar at Peking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focus is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Email: chenbo\_2008@126.com

---

在当代理论发展过程中,终结论作为备受关注的话题深受哲学、艺术、历史、文学等诸多学科的关注与思索。从“哲学的终结”、“美学的终结”到“艺术的终结”,从“上帝死了”、“人死了”到“作家死了”,从“历史的终结”到“艺术史的终结”,从“印刷文明的终结”、“书籍的消亡”到“文学的终结”,从“意识形态的终结”到“理论的终结”,这些看似相关或无关的观点擘画出一幅终结论的地图。在这幅地图上,既有如黑格尔、尼采、阿多诺、海德格尔、雅克·德里达、米歇尔·福柯、罗兰·巴特、阿瑟·丹托等著名的哲学家、美学家,也有如希利斯·米勒、特里·伊格尔顿等知名的文艺理论家,以及如博尔赫斯这样的作家的参与。那么,博尔赫斯与终结观有哪些关系呢?在这些潜在或显在的联系中,如何认识博尔赫斯的话语与作用?如何评价博尔赫斯与终结论的关系?这是国内博尔赫斯研究亟需揭橥和廓清的重要问题。

# —

在当代艺术史上,较早关注博尔赫斯与艺术终结问题的是美国著名哲学家、艺术批评家阿瑟·丹托。丹托有感于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各种前卫艺术对艺术传统与艺术体制的冲击和破坏,特别是面对日常物品与艺术品、低俗图像与高级艺术之间界限的模糊与消弭,他认为有必要对这些艺术现象做出哲学上的思考与回应,最终他提出了“艺术的终结”观。

丹托为其“艺术的终结”观选择的文学例证是博尔赫斯的“想象文本”,他说:“作家博尔赫斯想象有两种文本,一个是西班牙大师塞万提斯的,写于16世纪,一个是19世纪象征主义诗人的,都是由同样的单词组成——然而博尔赫斯认为,它们在风格上完全不同”(《美的滥用》3)。丹托所说的“想象文本”是指博尔赫斯在小说《〈吉诃德〉的作者皮埃尔·梅纳尔》中谈及的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与他所虚构的法国作家皮埃尔·梅纳尔的《吉诃德》。<sup>①</sup>正如丹托指出的,这两个文本完全相同,但博尔赫斯却认为梅纳尔的《吉诃德》比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更“微妙”,更“丰富多彩”,更富有艺术性。两个相同的文本,为何产生不同的艺术效果?其中又蕴含着哪些艺术特点与艺术价值呢?

从表面上看,博尔赫斯“想象文本”的奇妙之处在于两位不同时代的不同作家创作了相同的文本,但深层的意义在于博尔赫斯处理生活世界与艺术世界的方法。《堂吉诃德》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但塞万提斯反对将现实写入作品,他认为生活和诗意是对立的。19世纪的现实主义创作强调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主张将生活与诗意相联系。博尔赫斯则将现实与诗意相融合,这和杜尚、沃霍尔等艺术家的艺术理念不谋而合,即他们的作品都模糊了现实和艺术的界限。这使得博尔赫斯的“想象文本”成为丹托需要的典型例子。丹托从博尔赫斯的“想象文本”等艺术作品中体悟到了艺术本体、艺术创作方式以及艺术存在方式的变化,认为艺术将依赖于哲学的阐释而存在,艺术已经被其自身的哲学所取代。博尔赫斯的想象文本、杜尚的现成品艺术、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约翰·凯奇的《4分33秒》、各种前卫舞蹈等预示着艺术和生活的界限已经消失,每一件寻常物都有可能成为艺术品,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艺术家,现代主义意义上的“纯粹”艺术已经衰落,当代艺术愈来愈需要哲学性的解释和分析,其存在方式已然变成哲学式的,结果便是“艺术随着它本身哲学的出现而终结”(《艺术的终结》121)。当艺术和哲学之间的界限被取消,“由于已变成哲学,艺术实际上完结了”(《艺术的终结》97)。丹托同时指出,各种前卫艺术品的出现是艺术家“用极端的方式提出了艺术本质的基本问题”。那么,博

尔赫斯的想象文本反映出怎样的艺术本质问题呢？

“什么是艺术”一直是西方美学探讨的重要问题，并形成了诸如模仿说、表现说、理想说、经验说、惯例说等许多关于艺术本体的见解。其中，柏拉图模仿说的影响最为久远。梅纳尔的《吉诃德》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似乎构成了摹本与原本的模仿关系，因为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创作在前，梅纳尔的写作在后，梅纳尔要创作《吉诃德》只能参照塞万提斯的作品。但是，梅纳尔“从未打算机械地照搬原型；他不想模仿”（《博尔赫斯全集·小说卷》92）。<sup>②</sup>他反对那些“把基督搬到林阴大道，把哈姆雷特搬到大麻田、把堂吉诃德搬到华尔街”（91）之类欺世盗名的作品，他想写出某些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相同的篇章，他创作的不是现代的堂吉诃德，而是本来的堂吉诃德。于是，摹本与原本不再有高低之分，二者不再是影子与实体的关系，而是同一性的存在，这实际上消解了柏拉图的模仿说。因为在柏拉图的理论中，原本是指理式，它的存在是客观的，作为艺术品存在的摹本只能分有原本的“光辉”，不可能达到原本的完美，充其量只是其拙劣的模仿，是“影子的影子”，“模仿的模仿”，和真理隔着三层。梅纳尔的《吉诃德》不仅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相仿，而且超越了《堂吉诃德》，成为当代作品中反叛传统艺术观念的极佳案例。

博尔赫斯不仅颠覆了柏拉图的理式论模仿说，而且试图消解文学与哲学的对立。一直以来，虽然有作品表达哲学、宗教思想，如古希腊悲剧表现的“命运”观、《圣经》表现的神学思想、萨特作品表现的存在主义哲学观等，但文学与哲学处于对立的两极却是客观事实。文学用富有情感的隐喻化语言表现丰富多彩的世界和人生，哲学用富有逻辑的抽象性概念揭示世界的本原与人的本真性存在的真理，二者的异质性早在古希腊时期就被哲学家柏拉图所发现。柏拉图不仅将二者对立起来，而且还主张将哲学家尊为理想国的最尊贵者，将诗人逐出理想国。这种二元对立的观点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既被拥护传统的哲学家奉为圭臬，又是挑战传统的哲学家攻击的目标。法国著名解构主义理论家德里达通过解构文学与哲学的二元对立，试图从根本上颠覆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传统。德里达认为，传统中文学与哲学的对立是不存在的，区别仅在于文学承认隐喻和虚构，而哲学不承认隐喻。德里达说隐喻是哲学文本的“白色神话”（Derrida 5），缺失了隐喻，哲学将变得苍白无力。其实，文学与哲学除了对立冲突之外，还有交集相生的一面，二者都离不开语言，而且文学的虚构与想象能够为哲学注入鲜活的生机与活力，哲学的深邃与智慧能够提升文学的视野和境界。所以，在历史上不断有理论家为诗辩护。在当代，更有理论家主张拆除文学与哲学、文学与理论之间的藩篱，有的甚至还主张将哲学纳入文学研究的范围。尤其是随着文本概念内涵和外延的不断扩大，哲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准确地说哲学作为某种文学类型——的特征愈来愈明显。文学对哲学的剥夺在博尔赫斯这里已然成为事实，在《〈吉诃德〉的作者皮埃尔·梅纳尔》中，博尔赫斯借梅纳尔之口否定了哲学、神学探寻终极问题的先在性与必要性，他说：“神学或形而上学所论证的终极——外部世界、上帝、偶然性、宇宙形式——并不先于我的小说或者比它更普通。惟一的区别是哲学家们在他们工作中期就出版了那些漂亮的作品，而我决心使它们消失”（92）。博尔赫斯将哲学与小说并置的做法消解了哲学与文学的对立，而“决心使它们消失”的观点体现出博尔赫斯作为一名作家的自信，即通过文学表现形而上的真理。

用艺术作品表现真理与哲学对真理的揭示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它们都是对存在的本真性与本源性问题的探寻与揭示。这一认识能够纠正长期以来人们的错误认识，即认为

美属于艺术,真理属于逻辑学。其实,艺术之为艺术的根本在于作品,而作品之为作品的本源是艺术,海德格尔指出,“艺术在艺术一作品中成就本质”,“我们只能从艺术的本质那里经验到”作品(2)。作品通过揭示真理而有别于日常事物或庸常之物,艺术则通过保存作品中的真理而生成。所以,用艺术作品表现真理是可行的。

纵观博尔赫斯创作的一生,他始终在践行这一准则,他的散文往往探索永恒、时间、轮回、循环、存在等终极问题,他的小说总是饱含着对哲学与宗教思想的表现与思索,他的诗歌总是涌现着对存在之谜和虚幻现实的沉思与咏叹。可以说,他用文学表现了哲学、宗教问题,用美开启真,使之走向澄明与无蔽。

## 二

“惊奇”是文学作品的重要特性,也是其艺术独创性之所在。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强调的就是作品带给人与众不同的奇异的审美感受。梅纳尔创作《吉诃德》的目的是“惊世骇俗”(92),他制造惊奇的技巧是“故意搞乱时代和作品归属”,从而使“最平静的书籍充满惊奇”(97)。

博尔赫斯通过梅纳尔的创作活动批评了西方传统中强调作者作用的人本主义小说传统,指出如果把类似于《基督的模仿》这样的作品当成詹姆斯·乔伊斯的著作实际上是对脆弱的精神象征的巨大革新,是对那些将作品视为作者附属物观点的批判。但是,博尔赫斯并没有让梅纳尔的创作活动走向反现实的一面,而是一再强调梅纳尔《吉诃德》的真实性。

真实性常常伴随着想象和虚构存在于文学艺术活动中,如何区分真实与想象、现实与虚构是文艺理论的重要问题。后现代小说家通过消弭现实与虚构的界限创作了许多文学作品,博尔赫斯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认为现实就是虚构,虚构就是真实,所以他有时喜欢写假想作品的评论,这样不仅可以减少叙述,使叙述消隐在评论之后,而且能够变虚构为真实。《〈吉诃德〉的作者皮埃尔·梅纳尔》就是一部这样的作品,其中,叙述者不仅赋予梅纳尔以法国尼姆的象征主义诗人的身份,而且指出他受爱伦·坡、波德莱尔、马拉美、瓦莱里和埃德蒙·泰斯特的影响,还为他草拟了一份作品名目,这样就为虚构的梅纳尔披上了一层现实的外衣。博尔赫斯通过梅纳尔的创作活动批评了19世纪的现实主义历史观。他说,梅纳尔的创作是对福楼拜历史小说《萨朗波》的藐视。虽然福楼拜宣称《萨朗波》是有关迦太基故事的书,但读者很容易发现这部书是一位19世纪的作家写的,并不是在迦太基创作的,因为作品或多或少留有时代和作家的痕迹。19世纪的历史小说往往从历史现实出发进行写作,具有一种客观的历史主义范式;但梅纳尔的历史观则是主观性的,“他给历史下的定义不是对现实的探索而是现实的根源。对他说来,历史的真实不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而是我们认为已经发生的事情”(96)。梅纳尔的历史观否定客观现实,强调主观意识。对主观意识的强调让博尔赫斯能够冲破传统历史观和小说创作的范式,将塞万提斯和虚构的梅纳尔及其作品并置在一起进行“评论式写作”。

这种写作方式带来的艺术真实性实际上和博尔赫斯高超的艺术技巧是分不开的。在小说创作中,博尔赫斯喜欢用元小说、互文性、讽拟、自我指涉等手法。元小说,也被称为“超小说”,“超小说的作家们喜欢偷偷地把可能会招致的批评纳入他们的文本里,使之‘小说化’”(洛奇 232)。在作品中,博尔赫斯设想了梅纳尔的《吉诃德》可能招致的三种批评,即作者跟随主人公心理写作、抄袭和尼采的影响,而这三种批评恰恰是博尔赫斯对《〈吉诃德〉的作者皮埃尔·梅纳尔》发表后可能招致的批评进行的设想。博尔赫斯还从

叙述者的视角指出梅纳尔“屈从或讽刺的习惯”实际上是对批评者试图把握作者意图进行评论写作的讽拟。再者，作品中出现的诸多引语和作家的事例构成了互文本的存在。最后，叙述者在介绍梅纳尔的个人经历和事迹时往往不断地指涉作者本身，使文本具有了自我意识，这恰恰是元小说作品的本质所在，“元小说作品是指由这样一些人写的作品：他们清楚怎样讲故事，但他们的叙事却在自我意识、自觉和反讽的自我疏离等不同层面上返回叙事行为本身”（柯里 70）。元小说作品往往呈现出元叙事、元语言、元批评的特点。由此，博尔赫斯找到了小说创作的途径，实现了虚构与现实的同一，创作出《小径分岔的花园》等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

虽然博尔赫斯创作了很多影响深远的小说作品，但他对小说的命运深感忧虑与担心，他甚至在 1967 年哈佛诺顿讲座第三讲《说故事》中公开提出了“小说的死亡”观。他认为，诗人和诗在长期的发展中逐渐演变并分化为二，诗人由原来的“创造者”分化为吟唱者和说故事的人，诗也分成抒情诗和小说。后来，诗人创造者的身份逐渐被说故事者的身份所遮蔽，诗的叙述性逐渐湮没了吟唱的功能，于是说故事者声誉隆盛，小说大行其道。随着小说在发展中形成了成熟的叙述模式和技巧，到了 19、20 世纪几乎所有的故事情节已经被当时的作家创造出来，当代作家只好在情节的改写与转换上下功夫，“发明的激情也许会灵光乍现，不过我们随即又会发现，这许许多多的故事情节其实不过是少数几个基本模式的表象而已”（《博尔赫斯谈诗论艺》55）。而且，小说面对人类重大事件时不再如史诗那样进行书写与吟唱，加之读者阅读趣味的变化和对史诗的渴望，以上种种变化使博尔赫斯认为小说正在走向死亡，他说：“我认为小说正在崩解。所有在小说上大胆有趣的实验——例如时间转换的观念、从不同角色口中来叙述的观念——虽然所有的种种都朝向我们现在的时代演进，不过我们却也感觉到小说已不复与我们同在了”（《博尔赫斯谈诗论艺》59）。博尔赫斯虽然断言小说将走向死亡，但他并不认为人类讲故事和听故事的兴趣会消失，他宣告“小说的死亡”是为了史诗的复兴以及诗人创造者身份和吟唱故事能力的恢复。

当然，“小说的死亡”并非博尔赫斯的首倡。据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回忆，1954 年他开始发表作品时，“小说已经死了”的论调就不断被人提起。原因是大众传媒技术的发展和专业知识领域的大量信息挤压了小说的空间，降解了人们对小说的期待与向往，小说走向死亡的命运似乎不可避免了。富恩特斯认为，小说具有补充的功能，它既“创造世界的语言补充物”，又是“现实的创造者”（9-10），它能够运用语言创造艺术的世界，当它进行创造时，它就变成了世界的艺术。而且，它的想象和所表现的时间意识能够带给读者无限的阅读空间。博尔赫斯指出，每次重读都是一次重新写作，每个阅读《堂吉珂德》的读者都会像梅纳尔一样成为《堂吉珂德》的作者。因为读者并不是被动的接受者，一旦阅读活动开始，他们就参与了作品的创作。作品呼唤它的读者，并将其引向作品的再创作，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让梅纳尔决心用另一种外语翻译创作自己的《吉珂德》，梅纳尔也等待着第二位皮埃尔·梅纳尔将他的工作彻底翻转过来并发掘出遗失的文明古迹。在《吉珂德的部分魔术》中，博尔赫斯指出，既然作品中的主人公能成为读者或观众，那么读者或观众也可能成为作品中的主人公。因此，只要读者和阅读活动存在，只要人们还有对神秘未知世界的渴求，小说就不会死亡。

时代在推移和发展，文学也在不断变化与革新，文体文类的兴衰更替自然不能避免。小说从原来的不登大雅之堂到领时代之风骚，再到今天的风靡全球，其中个味可谓五味杂陈。博尔赫斯从时代、读者需求、现实和个人体会出发，提出“小说的终结”，意在唤起

人们对史诗和诗人创造者身份的重视,其意甚好,只是他所向往的那种如好莱坞史诗电影之类的创作很难在当今文学中再现。因为在当前大众消费文化、商业文化主导下的受众和作家更喜欢滑稽和喜剧,崇高与悲剧往往成为被解构的对象,所以,以往的宏大苦难叙事或英雄叙事很难被当下普遍接受。就目前来看,小说不会终结,但那种纯粹“技巧展示场”式的小说终究会成为过往,也许博尔赫斯一语成谶,他所说的那些种种朝着时代演进的大胆有趣实验的小说终将“不复与我们同在了”。博尔赫斯是个例外,因为他的小说超越了时代的局限,具有了世界性。

### 三

如果说“艺术的终结”体现的是博尔赫斯的“想象文本”所具有的艺术价值的话,那么,“小说的死亡”体现的则是对小说未来的预测。和其他倡导终结论的理论家不同,博尔赫斯除了参与——有时是被动的——某些终结论话题的讨论之外,还坚决捍卫他所秉持的美好理想。尤其是面对广播、影视、电脑等新媒体和技术力量的迅猛发展与巨大变革,很多人宣称书籍死了、印刷文明终结了,博尔赫斯坚决捍卫书籍的地位,反对“书籍的消亡”论。

书籍对博尔赫斯而言有着重要的意义,他喜欢读书、藏书,而且还辛勤著书,并形成了自己的书籍观。他认为,书是一种“写作的艺术”,是由一系列的潜文本、互文本、副文本等构成的,“对作者来说,书并不是一种表现或者一系列表现,而是按照字面意义解释的卷册,即由纸张组成的六面长方体,必须具备封面、外封、手写体字母的题词、斜体字母的前言、开头是大写字母的九个或十个章节、内容目录、有沙漏图形和一句精辟的拉丁文的藏书票、简单扼要的勘误表、几张白页、小号字排印的版权页、出版者名称和年月日:这些众所周知的内容构成了写作的艺术”(《博尔赫斯全集·散文卷(上)》92)。后来,他从显微镜、望远镜是人的眼睛的延伸、犁和剑是手臂的延伸等观念中形成了关于“书”的新认识,即“书籍是记忆和想象的延伸”(《博尔赫斯全集·散文卷(下)》5),是自我存在的确证。

博尔赫斯主要是从历史、宗教和文学等方面阐述了书籍的重要性。他认为,书籍是口头语言的替代物。古人重视口述,不重书写,所以像苏格拉底、孔子、基督、佛陀等皆是口授大师。口述要求人们用心记忆,努力回忆,在记住大师言语的同时使大师和他们的思想轮回不朽;书写是用文字符号将思想记述下来,是为了避免遗忘,但却常常导致遗忘。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指出文字会让人依赖写下的东西,不再努力记忆;文字会让人依靠书写的符号来回想,而非用心回忆,所以,文字只能提醒人们,不能治疗健忘,反而在人的灵魂中播下遗忘。文字使学习者无师自通,让他们觉得充满了智慧,但是文字所提供的并不是真正的智慧,而是智慧的赝品(197-198)。口述能锻炼人的记忆力,在发明书写以前的漫长时代里,记忆是人们留存知识、传播文明的重要手段,所以,人们发明了一种专门识记的技艺——记忆术。有的人天生具有完美的记忆力,能够依靠简单的记忆术秘诀记住一切,他们被称为记忆术专家。博尔赫斯的小说《博闻强记的富内斯》中的富内斯就是这样一位记忆专家,他有着精确的时间感和超强的记忆力,能够记住大千世界的一切,难以遗忘,却饱尝失眠之苦。

书籍作为人类文明的载体,是印刷文明的集中体现,也是书写文化的高级形态。书籍地位的确定和宗教、国家统治的需要有关,比如“经书”观念的形成。在我国,经书的产

生和汉代实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其他文明中的经书观念往往和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受宗教学说的影响，博尔赫斯创作了很多表现书的作品，《通天塔图书馆》表现了无限图书馆中的一部包括世界上所有书籍的循环之书，它就是“上帝”；《阿威罗伊的探索》认为《古兰经》是书籍之母；《沙之书》中，博尔赫斯创作了一本神秘的、有无穷页码的、像沙一样，没有始终的“沙之书”，这本书是《圣经》的某个版本。

博尔赫斯还把作家创作的书籍视为一个国家或民族记忆的载体，指出它们往往具有补充民族性格的功能。英国选了喜欢夸张的莎士比亚作为国家文学的代表，虽然这个国家很含蓄；德国选择温和的歌德为代表，其实这个国家很狂热；阿根廷选了一部逃兵的纪事录《马丁·菲耶罗》为代表；西班牙选了塞万提斯为代表。由此，博尔赫斯认为，“仿佛每个国家都得有一个不同的人来做代表，这个人可能成为医治这个国家的毛病的某种特效药、抗霉素、解毒剂”（《博尔赫斯全集·散文卷（下）》10）。

博尔赫斯捍卫书籍存在的合理性，还与他文学的热爱有关。和萨特一样，博尔赫斯将文学视为他的命运。西方现代意义上文学概念的产生同印刷书籍以及其他印刷形式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书籍消亡了，那么文学也就不存在了，这就是美国当代著名解构主义评论家希利斯·米勒宣布“文学终结”的原因之一（8-9），这也是博尔赫斯反对书籍消亡的一个原因。此外，博尔赫斯还认为书籍能给人带来诗意的阅读体验和审美享受，他把阅读当作幸福的事情，提倡快乐的阅读，反对阅读书评，倡导阅读原著，鼓励重读。

由于上述原因，博尔赫斯认为书籍不会消亡。但是，应该注意的现实是，随着互联网、数字化技术以及信息传媒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社会快速进入“图像时代”、“读屏时代”，“电子书”取代纸质书成为大势所趋。当人们日益适应和喜欢从“书屏”中阅读文本，并互动交流时，书籍的权威将会被冲淡，书写的神话将会被祛除。虽然博尔赫斯坚决反对，也有如安贝托·艾柯、<sup>③</sup>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sup>④</sup>等人的捍卫，但“网络阅读”、“读图”、“读屏”群体的日益壮大却是不争的事实。所以，美国当代著名作家、评论家苏珊·桑塔格在博尔赫斯逝世十周年写的《给博尔赫斯的一封信》中不无悲观地说：“很抱歉，我不得不告诉你，书籍现在被认为正濒临灭亡。”这不仅仅指书籍，“还泛指使文学成为可能和给灵魂带来影响的阅读条件”，当这些都已消失时，也就“意味着内心世界的死亡——以及书籍的死亡”（桑塔格 128）。当前，人们的阅读取向和审美趣味越来越陷入博尔赫斯所批评的“明目张胆的实用主义”，碎片化阅读、功利性阅读将书籍的文呈“星形裂开”，变成“碎散的文”（巴特 74-75）。当人们出于实用主义的目的把书籍变成可以互动的文本时，当互联网、掌上电脑、手机等赋予公众更大的民主时，当各种高清晰的图像满足大众的视觉需求时，人们突然发现书写的文字已经沦为图像的附庸，图像的霸权已然呈现。很多时候，人们阅读书籍只是因为看了影视的改编。虽然印刷书籍在很长时间内还会具有相当的文化影响力，但是新媒体正在以自己的力量不断蚕食书籍的地盘，并日益取代它的统治。这并不是人类文明的灾难，而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毕竟，“只要人脑在活动，就会不断地产生各种各样的脑文本”（聂珍钊 14）。虽然文本的载体会发生变化，就如书籍和电子文本一样，但是作为元文本的脑文本将会随着人类脑力活动和物质实践的不断开展而丰富，进而创造出更为多样的文学，因为“直到今天，作家创作任何文学作品，从根源上说都是对脑文本的回忆、组合、加工、复写、存储和再现。可以说，没有脑文本，就没有作家的创作，也没有物质文本和电子文本。没有脑文本，也不可能产生任何形式的文学”（聂珍钊 14）。因此，脑文本的存在让人们坚信文学不会终结，书籍作为物质文本将与电子文本一道继续陶冶人

类的精神文化生活。

#### 四

任何一种理论的生成都不是凭空的,需要一定的场域,离不开时代、历史、文化的语境,更离不开理论家“天才”般的发现、敏锐的感受力和敢于表达理论的自信。形形色色的终结论的提出同样如此,都是终结论者针对具体现象或问题做出的睿智思考与判断。

博尔赫斯提出终结论的根本原因是他对人生价值与生存意义的思索。祖先的光荣业绩和父母对他的期望让他承载着恢复家族荣耀和创造功绩的重任,但是体弱和眼疾使得他只能用文学之笔开疆拓土。然而,父亲的离世和嘱托更加重了他对有限生命和虚妄生存的焦虑。一方面,父亲不成功的文学之路就像一面镜子映照着博尔赫斯,让他恐惧,害怕自己的未来同父亲一样走向失败;另一方面,父亲临终前的嘱托——请求博尔赫斯重写自己的小说《酋长》——让他陷入了客观现实和本真自我的矛盾造成的“非现实”之中,令他深受个性的虚无之苦,他强烈地意识到重写是对原作者身份的削弱和对重写者创作个性与独创性的伤害,由此会造成“作者的死亡”,这种思想促使他创作了小说《〈吉诃德〉的作者皮埃尔·梅纳尔》。<sup>⑤</sup>其中,梅纳尔对《堂吉诃德》的重写不仅毁灭了自己的创作个性,而且抹杀了塞万提斯原来的风格,让作者走向了终结,而小说中的“想象文本”则为当代艺术界的“艺术终结论”提供了重要的文学范例。

博尔赫斯思考终结论的现实原因和出发点基于他对文学事业的不懈追求。他将写作视为实现生命意义、救赎自我、表征自我存在的重要途径,对他而言,写作是一项神圣的事业。从提倡极端主义开始,他就一直追求文学表现的原创性,并将其视作思考个人和现实世界哲学关系的方式之一,所以他常常用文学表现哲学主题。同时,他还追求技巧的创新。他革新了拉美文学的语言,创造了“散文-小说”式的文体,进行了讽拟、置换、互文、重写、并置、改写、伪造等多种形式的文学实验,形成了玄幻的创作风格,深深地影响了拉美文学乃至世界文学,被尊为“作家们的作家”。因此可以说,博尔赫斯的终结论体现着他对文学创新的自觉探索和对文学未来的深入思考。

作为一名书斋内的作家,博尔赫斯不仅能够沉潜于文学创作,而且,他还依靠文学感知传统与现实、自我与世界的本质。透过文学,他洞晓了宇宙的神秘和世界的虚幻;通过文学,他表现了玄奥的真理和不可知的存在。他用文学书写了但丁式的自我救赎神话,解决了曾面临的父子间的卡夫卡式关系,解构了家族神话和作家神话,嘲讽了现代主义艺术家,启发了后现代主义艺术家,创造了自己作为世界主义者的文学成就。怀疑论者、不可知论者、唯我论者、无政府主义者、保守派、激进派、反民族主义者、和平主义者……这些标签体现出博尔赫斯作为现实个体的政治性和主体性,但“文学大师”和“作家们的作家”的称谓更可以表现他的世界意义和存在价值。他曾坦言自己不是一位思想家,而是一位在艺术上用心编织梦的文人(Williamson 477)。因此,他能够每每在文学面临危机或转型的时刻,直面终结论问题,提出“作家的死亡”、“小说的死亡”等论题,积极捍卫文学的价值和书籍的地位。

博尔赫斯作为“我们作家中最为知性的、最为抽象的作家,也是一个最能讲故事的人”(略萨 141),他对终结论的思索是知性的,他并不企盼构建宏大而严谨的理论体系,而是以文学的形式艺术化地表达他的观点与看法。虽然作为个体的博尔赫斯已经消亡,但是作为文本的博尔赫斯将会和读者与文学同在。或许,当终结论者终结之后,探讨终结论者



的终结观颇有些不合时宜。但终结不是完结，而是新生，因为“世上还没有过任何终结了的东西；世界的最后结论和关于世界的最后结论，还没有说出来；世界是敞开着，是自由的；一切都在前头，而且永远只在前头”（巴赫金 221）。所以，应当坚信：只要人类依然存在，对话仍将继续。敞开的世界与开放的思想将引领人们穿越终结论者的话语迷雾，走向本真与自由。

### 注解【Notes】

①《〈吉诃德〉的作者皮埃尔·梅纳尔》是博尔赫斯创作的一篇虚构性作品，收录在《虚构集》中。在该作品中，梅纳尔的《吉诃德》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是同一的。

②本文相关引文均出自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全集·小说卷》，王永年 陈泉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以下标出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③意大利著名的美学家、小说家艾柯认为书籍不会消亡，因为书籍从被发明伊始，其用途或结构是稳定的，难以进行改善，虽然其组成部分会有所演变，甚至书不再是纸质的，但书还是书。而且，书写已经成为直接与人的身体相连的近似天然的交流技术，电影、网络、电脑等新媒介由于自身的不足很难取代书籍。参见卡里埃尔 艾柯：《别想摆脱书：艾柯、卡里埃尔对话录》，吴雅凌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4、7、19。

④秘鲁-西班牙作家、诗人略萨承认电子书的现实以及电子书对纸质书籍的冲击，但反对书籍的消亡论，认为书籍会在互联网上存活，只是电子书让文学变得平庸，读者有责任不让文学庸俗化。参见于凤川：“巴尔加斯·略萨论文学与互联网”，《中华读书报》2010年10月27日，第17版。

⑤详见陈博：“博尔赫斯与罗兰·巴特的作者身份地位理论比较”，《社会科学家》4（2014）：127-130。

###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巴赫金：《诗学与访谈》，白春仁 顾亚铃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Bakhtin, Mikhail. *Poetics and Interview*. Trans. Bai Chunren and Gu Yaling, et al.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1998.]

罗兰·巴特：《S/Z》，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Barthes, Roland. *S/Z*. Trans. Tu Youxiang.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0.]

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全集·小说卷》，王永年 陈泉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

[Borges, J. L. *The Complete Fiction Works of Borges*. Trans. Wang Yongnian and Chen Quan. Hangzhou: Zhe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6.]

——：《博尔赫斯全集·散文卷（上）》，王永年 徐鹤林等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

[---. *The Complete Prose Works of Borges*. Vol.1. Trans. Wang Yongnian and Xu Helin, et al. Hangzhou: Zhe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6.]

——：《博尔赫斯全集·散文卷（下）》，黄志良 陈泉等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

[---. *The Complete Prose Works of Borges*. Vol. 2. Trans. Huang Zhiliang and Chen Quan, et al. Hangzhou: Zhe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6.]

——：《博尔赫斯谈诗论艺》，陈重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

- [---. *This Craft of Verse*, Trans. Chen Chongren.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8.]
- 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宁一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 [Currie, Mark. *Postmodern Narrative Theory*. Trans. Ning Yizhong. Beijing: Peking UP, 2003.]
- 丹托:《美的滥用》,王春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 [Danto, Arthur C. *The Abuse of Beauty: Aesthetics and the Concept of Art*. Trans. Wang Chunchen.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7.]
- :《艺术的终结》,欧阳英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 [---. *The Philosophical Disenfranchisement of Art*. Trans. Ouyang Ying.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1.]
- Derrida, Jacques. "White Mythology: Metaphor in the Text of Philosophy."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 6. 1 (Autumn, 1974): 5-74.
- 卡洛斯·富恩特斯:“小说死了吗?”,赵德明译,《外国文学》6(1995):5-16。
- [Fuentes, C. "IS the Novel dead?" Trans. Zhao Deming. *Foreign Literature* 6 (1995): 5-16.]
- 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
- [Heidegger, M. *Holzwege*. Trans. Sun Zhouxing.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4.]
- 略萨:“博尔赫斯的小说”,史国强译,《当代作家评论》1(2011):138-144。
- [Llosa, Mario Vargas. "The Fictions of Borges." Trans. Shi Guoqiang. *Contemporary Writers Review* 1 (2011): 138-44.]
- 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王峻岩等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年。
- [Lodge, David. *The Art of Fiction*. Trans. Wang Junyan et al. Beijing: 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1998.]
- 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秦立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 [Miller, J. Hillis. *On Literature*. Trans. Qin Liyan. Guilin: Guangxi Normal UP, 2007.]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口头文学与脑文本”,《外国文学研究》6(2013):8-15。
-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Oral Literature and Brain Text."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6 (2013): 8-15.]
- 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2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
- [Plato. *Completed Works of Plato*. Vol. 2. Trans. Wang Xiaochao.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3.]
- 苏珊·桑塔格:《重点所在》,陶洁 黄灿然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
- [Sontag, Susan. *Where the Stress Falls*. Trans. Tao Jie and Huang Canran, et al.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1.]
- Williamson, Edwin. *Borges, a life*. New York: Viking, 2004.

责任编辑:刘兮颖